

·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述在中国的译介史表明, 20 世纪不同时期内我国文学界对他的文学思想的接受具有不同的侧重, 其中, 存在着某些偏差; 20 世纪晚期国内评论界对高尔基文学思想也存在某些误解。就这些问题作出阐释,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了解高尔基。

[关键词] 高尔基;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中国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34(2005)04-0201-07

[收稿日期] 2005 - 06 - 02

[作者简介] 汪介之 (1952 -), 男, 安徽庐江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伴随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行程,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也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在一个长时期内, 相对于其他外国作家, 高尔基文学理论与批评著述在中国的译介, 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 由于 50 年代中期以前苏联文艺理论界对高尔基的片面阐释的影响, 中国文学界对于高尔基的理论批评成就的了解远不是全面的, 接受的偏离也在所难免。直至 20 世纪晚期, 致力于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努力才开始呈现。但是, 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 却难以一下子改变, 而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化, 则妨碍着人们校正自己的已有认识。鉴于此, 就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对高尔基文学理论的接受史, 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能真正走进高尔基的文学世界。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字在我国的译介, 始于 1920 年。这一年 10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8 卷第 2 号, 刊登了郑振铎译的高尔基《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此文是 1919 年高尔基为世界文学出版社第一批出版书目而写的。文中说明了该出版社的工作主旨和第一批出版书目的选题依据, 阐述了文学的一般作用, 特别强调了翻译出版各国文学名著的巨大文化意义。到 1928 年,《奔流》月刊第 1 卷第 7 期又发表了郁达夫译的高尔基《托尔斯泰回忆杂记》。这类文学回忆录, 大都涉及文学批评, 有的就是十分精彩的作家论。此后, 高尔基文学论文的译文便不断出现在我国报刊上。

由鲁迅选编、上海光华书局 1930 年出版的《戈理基文录》, 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高尔基文

学理论与批评文集。书中收有论文 7 篇。由此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先后出版了多种高尔基文学论文选集，主要有：廖仲贤编译的《给青年作家——高尔基论文选集》（1935），林林从日文转译的《文学论》（1936），以群转译的《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1936），周天明、张彦夫编选的《高尔基选集》第 5 卷“论文”卷（1936），楼逸夫翻译的《高尔基文艺书简》（1937），杨伍编译的《高尔基文学论集》（1937），以群、荃麟合译的《怎样写作——高尔基文艺书信集》（1937），孟昌译的《文学散论》（1941），曹葆华翻译的《苏联的文学》（1943），戈宝权翻译的《我怎样学习写作》（1945）等。

除了上述高尔基文学论文的译本之外，同一时期我国出版的多种译文集中，也收有高尔基的论文。如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1936）上卷中，就收有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论文 20 余篇。靖华、琦雨等译的《给青年作家》（1937），伍蠡甫、曹允怀合译的《苏联文学诸问题》（1937），曹靖华翻译的《致青年作家及其他》（1941），徐中玉辑译的《伟大作家论写作》（1944），胡风辑译的《人与文学》（1943），茅盾等译的《外国作家研究》（1943）等，也都收录了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或相关言论与文字。

上述文集中，有不少曾多次再版。如楼逸夫译的《高尔基文艺书简》，从 1937 年到 1949 年，就出过 6 版；靖华、琦雨等译的《给青年作家》，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出了 5 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刊物，如《奔流》《文学》《译文》《北斗》《萌芽月刊》《文艺月报》《时代》《苏联文艺》等，都刊载过高尔基文学论文的译文。译者当中，有鲁迅、郑振铎、郁达夫、瞿秋白、胡风、柔石、冯雪峰、夏衍、曹靖华、曹葆华、楼适夷、孟昌、吕荧、戈宝权、黄源、叶以群、伍蠡甫、徐中玉等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这一切都表明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在现代中国受重视的程度。

进入 50 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文学理论著作的译介开始朝着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缪灵珠翻译的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1956），孟昌、曹葆华合译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选》（1958），巴金、曹葆华合译的高尔基《回忆录选》（1959），曹葆华、渠建明合译的高尔基《文学书简》（上、下卷，分别出版于 1962 年和 1965 年）等，构成“文革”前 17 年间我国译介高尔基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的主要成果。前此出版的一些高尔基论著译本，在这一时期有不少经过重译、修订或补充后重新出版。适夷翻译的《契诃夫、高尔基通信集》（1950），以群、孟昌等翻译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等，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高尔基文艺言论的新译本。同一时期我国出版的《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1956）、《论剧作家的劳动》（1959）、《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60）等书，也收有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或言论。此外，高尔基文学理论的译文，还散见于这一时期的《文艺报》《译文》等多种报刊上。

“文革”10 年，高尔基文学理论在我国的接受处于停滞状态，直到 1978 年才重新开始。是年，孟昌等译的高尔基的《论文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同一出版社又推出冰夷等译的《论文学（续集）》。这两本译文集共收文学论文 66 篇，大大超过了 1958 年版《文学论文选》（含 28 篇论文）所收论文的数量。该出版社 1959 年版的高尔基《回忆录选》的一部分，以《文学写照》为书名，于 1978 年重新出版。1979 年，缪灵珠译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

20 世纪最后 10 年中新出版的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相关的高尔基著作，主要有臧乐安等翻译的《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1980），林焕平编的《高尔基论文学》（1980），王庚虎译的《高尔基论新闻和科学》（1981），孟昌选译的《高尔基政论杂文集》（1982）等。另外，余一中编选的《高尔基集》（1998）、朱希渝翻译的《不合时宜的思想》（1998）等，其中所收录的高尔基的文章、书信和言论，也有不少是涉及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这些新出版的译著或编著，大都带有填补前此高尔基文学理论译介领域之空白的性质。如《高尔基政论杂文集》

一书所收《论傻瓜及其他》、《高尔基集》中所含《两种灵魂》、《三人书简》中的有关信件等，不仅都是首次译为中文，而且大大扩充了人们对于高尔基文学思想的认识。同一时期在我国期刊上陆续发表的高尔基论著和言论的译文，如张羽翻译的《还是那些话》（1993），谭得伶选译的《高尔基给安·普拉东诺夫的四封信》（1988），郭值京译介的《高尔基给斯大林的两封信》（1993），汪介之译的《论俄国农民》（1987）、《高尔基致罗曼·罗兰的五封信》（1999）等，也具有同样的价值。

以上回顾使我们看到，高尔基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著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就有相当一部分被译介到我国来了，50至70年代末的译介工作则走向系统化，80、90年代的译介更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空白。因此可以说，在这方面，我国翻译界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译介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至少，《高尔基与20世纪初的俄国期刊：未发表的通信》（即《文学遗产》第95卷）这本厚达一千余页的文学书信集，基本上仍处于我国文学界的阅读视野之外。当然，更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译介，而在于理解和接受。

二

20—40年代，我国评论界对于高尔基的论著，注意的主要是他关于文学的社会作用、创作方法、文学修养方面的论述。由于这一时期苏联文艺界对高尔基的阐释，也由于当时我国新文学界倡导“革命文学”，强调文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因此在相当一些人的意识中，高尔基的文学思想，集中到一点，似乎就是提倡文学发挥歌颂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这种认识由为数众多的评论者所反复强调，久而久之，便成为人们“概括”高尔基文学见解的基本框架。它限制了人们去进一步了解作家的丰富文学思想。也许只有胡风等少数人突破了这一框架。胡风的一个基本见解是：文艺不仅要服从于、服务于社会政治斗争，而且还要揭示人民群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由此出发，胡风在论及高尔基时，特别强调后者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胡风认为，高尔基的伟大在于，他始终肯定人的价值，主张以文学改造人生，帮助人洗去“历史遗毒”，“追求‘无限地爱人们和世界的’，在至高的意义上说的‘强的’‘善良的’人”。[1]（P330）1936年高尔基逝世之际，胡风有感于当时评论界对高尔基文艺思想的片面认识，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比较高尔基的艺术思想底海一样的内容，我们所接受的实在太少，比较我们所接受的，我们的误解或曲解还未免太多罢”[1]（P334）。胡风是较早洞察到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和接受存在偏差的批评家，然而他的声音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非但如此，进入50年代以后，这位有胆识的批评家还横遭厄运，而他所感叹的“误解或曲解”却仍在继续。

胡风现象也许可以说是“文革”前17年中我国文艺指导思想日益极左化的最初表现之一。在这一大背景下，文学界对高尔基的理解和接受，只能基本上沿着前一个阶段的思路前行。《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1950）、《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1954）、《纪念高尔基，歌颂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1959）、《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典范》（1963）、《时代精神·革命真实·英雄人物》（1963）这类文章，充斥于那一时期的我国报刊。这些文章远远谈不上是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认真研究，其主旨不外是认定并强调他是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楷模。他的全部理论见解、全部文学活动，都被偶像化、典范化了。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书，其中收有高尔基谈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或言论、书信片断。同年，《文艺报》第6号还刊登了高尔基的一组言论，编者所加的题目是《高尔基论资产阶级文学遗产》。这两份材料有着双重的意义：既显示出当时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看取侧重，又划出了当时及此后一个长时间内人们认识高尔基理论

批评遗产的基本范围。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鼓吹者、资产阶级文学批判者的形象，就这样被人们接受下来了。

然而，当时也有些研究者、评论者没有盲目地跟着潮流跑，而是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显示出看取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另一种视角，即注目于作家的“人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例如，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认为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不但说明了文学的对象是什么，而且还把文学的对象同它的性质、特点、任务和作用等相统一起来了。他指出：“在今天，对于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见，是有特别加以强调的必要的。”^[2]作家巴金也从自己翻译高尔基作品的体验出发，把握到了高尔基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其实谈到高尔基的短篇，甚至谈到高尔基的一切作品，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够了。这是他自己的话。这是他在小说《读者》中对一个陌生读者的回答：‘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3]作家萧三的《高尔基的美学观》一书，同样表明作者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基本点有深入理解。书中写道：“千百年来，在人的心目中养成一种奴隶性的，对自己的身份、能力、理智估计过低的习惯。……改变这种轻视人的观点及为人的诗意形象而斗争，是高尔基在其文艺创作里及理论批评文字里一贯的方针。”^[4]（P37）从这里，不难看出对胡的某些观点的认同。遗憾的是，上述所有这些见解，都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更没有校正人们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片面认识。

也是在50年代，高尔基论著《俄国文学史》的译者缪灵珠，曾在中译本“后记”中，对作者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做过这样的概括：“以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态度作为文学史的主线——这种创举，应归功于高尔基。”^[5]（P590）虽然这部译著在50—60年代曾几度再版，但无论是原著的价值还是译者的见解，都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当然，从总体上看，50、6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对高尔基的文学思想还是相当重视的，这集中体现在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63）两本高校文艺理论教材中。两本教材都多次引用的高尔基的言论，其内容涉及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联系教材的框架体例和具体论述，可以看到编者在某些问题的解释和处理上是煞费苦心的，但仍然难免有某种尴尬。例如，两本教材都确认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但在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却难以找到高尔基对这一“主义”的特征和意义的明确阐释；《文学的基本原理》所引用的高尔基的几段话，并不是作家关于这一“新方法”的直接说明，引用者只能把高尔基就一般创作和文学工作发表的意见说成是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而发的。^[6]（P277）同时，教材只得主要依靠援引日丹诺夫和“拉普”领导人法捷耶夫的言论来为自己找到论据。又如，教材在谈及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等问题时，都把高尔基描述成“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者，但又无法回避他对一大批“资产阶级作家”的由衷敬佩和大力推崇。教材在引用这类推崇性言论时，都要强调一下高尔基“不是采取无选择、无批判的态度”，但往往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高尔基是坚持以阶级观点来看待以往的文学遗产的。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编者在“左”的文学观念的指导下，对高尔基的理解和阐释脱离了作家文学思想的实际。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述两本文艺理论教材均经修订后出版发行，在我国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自那时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对于高尔基文学思想的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两本教材开始的。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文学出现了五四以来接受外国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期。外来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大力反拨，对建国以来文学发展历史经验的回顾总结，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价值等在内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反思的结果，在缺乏对于高尔基文学思想的全面认识的人们那里，必然是导致对于他的种种观点的激烈否定。与此相对应，维护高尔基文学思想的权威性和正

统地位的人们，则依然在重复长期以来评论界对他的习惯性描述和评价。这两种观点是截然对立的，可是双方所依据的资料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一般很少能越出 30 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评论所设定的接受框架。如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1982）一书，分“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真善美”“劳动的美学”“文艺中典型形象的塑造”“用革命态度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榜样”“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五个方面阐述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只是对前此一个长时期内评论界的基本观点作了一个总结。它的主要不足，在于几乎完全回避了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这一核心论题。与这本书相比，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1995）一书在论述高尔基的文艺思想时，则提及作家关于形象思维和艺术创作中的“直觉”问题的论述，显示出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一种新发现。

三

80 年代以来，在我国评论界，对高尔基的文学思想持否定态度的观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高尔基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的相关言论；二是他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提法；三是他关于浪漫主义的两种不同倾向的观点。所有这些问题，都和以往我国文学界对高尔基文学思想的了解、接受和评论的片面性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这种否定正是对以往的片面阐释的一种惩罚。其实，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与定义的出笼及其被法令化，到这一整个过程前后高尔基的相关言论，再到高尔基本人的全部创作，这些文学史事实均清楚地显示出：高尔基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而且是当时苏联一整套极左文学指导思想和政策的激烈批判者。但是，斯大林时代的批评家们，为了极左政治和极左文艺路线的需要，却遮蔽了许多文学史真相，并在高尔基去世后对他的言论进行歪曲性解释，炮制出一个关于“奠基人”的神话。我国文学界曾经完整地接受了这一神话。于是，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了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时，便出现了否定高尔基的观点。应当懂得的是：极左文艺思想、路线和政策的根子是极左政治和个人崇拜，而不是一介书生高尔基。

高尔基曾经把 19 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这和他的文学史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尔基认为，现实主义是 19 世纪的一个主要的、最壮阔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不仅在技巧上是典范的文学作品，而且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这种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在高尔基看来，不仅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而且也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共同品性。因此他又说：“如果我们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那么我们一定会承认：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中，大都对现实采取批判、揭发和否定的态度，而且愈是接近我们，这种态度愈是强烈。只有那些凡夫俗子，只有那些其作品已经被人遗忘的没有多大才能的文学家，才满足于现实，才去迁就现实，赞美现实。那种公正地获得‘伟大’称号的文学，从没有向社会生活现象高唱过赞歌。”[7]（P255）高尔基还列举了从薄伽丘到福楼拜等一系列伟大作家的名字，指出：“他们没有一个曾经向现实讲过肯定的和高尚的‘是’”[7]（P255）。基于这些认识，高尔基把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不仅抓住了它的鲜明特征，而且确认了它的成就和价值。这一概念丝毫没有由于 19 世纪现实主义缺少“肯定”因素而贬低它的含义。相反，在对这一文学的批判特征的认定中，正体现着对于那些“高唱赞歌”的文学的怀疑态度。尽管如此，高尔基也从来没有要求或建议人们把 19 世纪现实主义一律叫做“批判现实主义”。

参阅汪介之《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刊于《译林》2002 年第 6 期。

关于浪漫主义，高尔基一向认为，还没有一个能为所有文学史家都同意而又十分全面的定义；但他又指出，浪漫主义中有两个不同的流派：“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堕入‘不祥的人生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8]（P163）。显然，高尔基是从对现实的不同态度来看待浪漫主义的不同倾向的。这和歌德以及席勒很早就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在视角和思路上都相近之处。高尔基没有把政治态度作为划分两类浪漫主义作家的准绳，更没有把浪漫主义划分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反动的浪漫主义”两个彼此对立的流派。十分明确地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对浪漫主义作出划分，并分别将其命名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进步的浪漫主义”和“反动的浪漫主义”[9]（P476 - 481）的，是苏联文艺理论家依·萨·毕达可夫等人。后来，我国学者编写的《欧洲文学史》模仿苏联文艺理论界的上述提法，作出了“反动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划分，其标准主要是作家们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今天，人们对这一划分方法提出怀疑和否定，既是出于对根据政治倾向来划分文学流派的庸俗观念的否定，又显示出对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上的深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如上所述，这一庸俗观念并非来自高尔基。

当我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一股或明或暗的排斥高尔基文学思想之际，老作家巴金却再次表达了他对这一思想的尊崇。他在1982年写道：“我苦苦思索的是这一件事情，是这一个问题：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10]（P410 - 411）巴金在这里重复了他早在1956年的那篇文章中就引用过的、但却较少有人注意的话。这句话看起来极为普通，却道出了高尔基文学思想的精髓：“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文学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巴金说出这番话前后，正是我国文学在经受长期劫难后起死回生的年代。全部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正是以对于“人”的重新发现为起点的。理论界重提“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不仅对1957年钱谷融的呼吁作出了一种悠远的回应，而且事实上是确认了最先作出这一精辟概括的高尔基的文学思想。尽管当时的某些理论家也许是出于某种“避嫌”的心理，显然不是无意地回避了这一命题的最初提出者高尔基的名字，但“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

与对钱谷融的呼应相类似，《俄国文学史》的译者缪灵珠在50年代对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所作的概括，也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回响。高尔基认为：“俄国文学大部分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在这里，在俄国文学里，知识分子追求较好生活地位的历史，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历史，乃至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内心生活的全部历史，是特别详尽、深刻、而且忠实地被描划出来。”[5]（P108 - 109）高尔基在这里不仅提供了一种看取文学史的独特视角，也甚为精当地概括了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俄罗斯文学是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心灵历史的形象描述；作为心灵创造物的作品，往往是创造者的心灵运动的形象记录。从高尔基那里获得启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赵园在她的《艰难的选择》（1986）一书中，由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来把握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勾勒出了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演变及创造者自身精神生活变动的轨迹，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呈现出它的一个特殊的侧面。这一研究成果生动地说明：在似乎早已过时了的高尔基文学思想中，还有许多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富藏。

我国当代一位批评家说过：“只有隐含在具体批评中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11]高尔基的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正包含在他的一系列批评见解中。如果我们读过高尔基关于布宁、安德列耶夫、别雷、巴尔蒙特、列米佐夫、索洛古勃、阿尔志跋绥夫等白银时代作家的评价文字，

也知晓他为那些在苏联时期遭到批判和限制的作家，如米·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叶赛宁、左琴科和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作的辩护、肯定和鼓励；如果我们了解他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思潮所进行的坚决抵制，他对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革拉特科夫的《动力》等“降低文学质量”的作品所作的严厉批评，他为此而和绥拉菲莫维奇展开的激烈论战，还有他在“批判形式主义”运动中留下的那些书信和论文，那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将是一位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高尔基。

[参考文献]

- [1] 胡风. M·高尔基断片 [A]. 胡风评论集：上册 [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 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 [J]. 文艺月报，1957，(5).
- [3] 巴金. 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所得到的 [J]. 文艺报，1956，(11).
- [4] 萧三. 高尔基的美学观 [M].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
- [5] 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6] 以群. 文学的基本原理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7] 高尔基. 论文学（续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8] 高尔基. 论文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9] 依·萨·毕达可夫. 文艺学引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 [10] 巴金. 谈自己·后记 [A]. 巴金选集：第10卷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11] 陈晓明. 打开生动而沉重的历史之门 [N]. 文艺报，2001 - 03 - 27.

[责任编辑：秦曰龙]

China's Acceptance of M. Gorky'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WANG Jie-zhi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looks back the history of acceptance of M. Gorky'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China, reviews the emphasis of acceptanc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ries to find their waps. It especially points out Chinese misunderstandings of Gorky's literary thought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explains the reasons.

Key words: M. Gorky;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